



长篇小说《东方》



韩瑞亨
来自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终结与先行——《东方》在当代军旅文学中的位置

魏巍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争和军旅生活的作家。他于抗战烽火初燃之时投身军旅，一手拿枪，一手执笔，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战斗，也在各个时期留下过文学的足迹。他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写下的长诗《黎明风景》，真实地抒写了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在那黎明前的暗夜里苦战奋斗的生活场景与情怀。他在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奔赴前线部队深入生活和采访，写下不少战地通讯、特写和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成了为人民战士的崇高荣耀命名的轰动一时的佳作。《东方》是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生活，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他在“文革”时代顶着压力，冒着风险，默默地进行艰辛的艺术求索。小说终于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出版，成为进入新时期之前军旅文学复苏的最初标识。

当我从《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选载的《东方》前10章时，立即被吸引住了，仿佛从荒芜已久的田园中蓦然见到一簇油绿的青苗、绚丽的春花。小说前10章中对于冀中平原上民俗风情的描写，如诗如画，声情并茂，似乎很久没有读到带着如此清冽的秋日露珠、泥土气息和青草香味的作品了。

《东方》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好像是从封冻的冷窟挣脱出来的文学新发的芽苗，让人们察觉到文学复苏的先兆，也为沉寂凋零已久的军旅文学带来振兴的最初希望。

老作家孙犁曾在1978年3月号《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创新的准备》一文。这位复出后的作家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便感应到那个时代的脉息，体察到被禁锢多年的文学亟待破茧而出的现实需求，他在文中呼唤文学出现创新局面，表达其除旧布新、振兴中国文学的心声。魏巍在同年出版的《东方》，仿佛以探索性实践呼应着孙犁的主张。这两位相识于晋察冀边区的友人，灵犀相通，同气相求，都在表达着冲破旧日的阴霾、迎接文学的春天到来的期盼。而1978年底正式提出并实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正是对这些作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急切改变文运、国运的期盼与现实需求的郑重回应。

《东方》是一部全景式地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它不同于此前已经发表和出版过的一些长篇小说和纪实作品，多是从局部或某一阶段的战事来展现这场颇具规模的战争。它力图对这场历时三载、艰苦繁难的战争进行全面而有中心的书写，不仅表现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完整过程，也对重大的战役和战斗、战场局势的演变、战略方针的转移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显现。它以邓军、周朴所带领的团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作战部队为中心，通过这个团入朝之后频繁、复杂、艰险的战斗活动，将朝鲜战场上进行过的各次重大战役和战事，有机地组织和概括于邓军、周朴团这个中心画面上来，既刻画出了这场战争的轮廓和发展轨迹，也揭示出这场战争的历史特点、正义性质和推动它走向胜利的强劲动力。小说在郭祥、乔大夯、王大发、花正芳、刘大顺等志愿军战士形象的刻画中，着力挖掘如团政委周朴所说的那种“极其深厚的东西”，即非凡的英勇气概与历史主动精神。它是从这些忠诚于祖国的人民战士对于自己庄严使命的理解中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使得他们敢于同世界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为主体的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进行殊死较量，并战而胜之。小说在宏大格局的营造，广阔而有纵深的战争生活描绘，志愿军战士群体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也使它对于这场战争的艺术表现，具有一定程度的史诗规模。

《东方》同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保卫延安》《红日》等军旅文学名著相比，在创作理念、艺术表达方式上已有不少拓展和突进。其一，它对于战争和军人生活的描写，不再拘守于战场，而延伸到战场以外的更广大的社会领域。它创造了志愿军战士郭祥、杨雪的家乡凤凰堡这个特定环境，作为当时国内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将战争时期的国内生活也化作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把前线与后

方穿插交错起来描写的结构布局，无疑扩展了对这场战争的表现幅度，是由单纯从军事斗争角度表现战争，转换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角度表现战争的新尝试。这种布局开阔的表现方式，有助于深度展示作品的艺术主题。

其二，《东方》在描绘激烈的对敌搏战的严酷环境中，作为一条重要支线，还描写了军队的内部矛盾和军中人物的负面形象。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军旅文学，还很少有作品直接接触及我军的内部矛盾，尤其是构成尖锐冲突的军队内部矛盾，也鲜见军中人物的负面形象。对于这一类在实际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现象，似乎有一些不能触碰的不成文的禁忌。《东方》的作者则以探索性实践，冲破了此类思想束缚。小说塑造了陆希荣这样一个军中负面人物形象，展现出陆希荣的极端个人主义与人民军队应当持有的理想信念和高尚情操，如何构成尖锐的冲突。由于思想意识的霉变，陆希荣从一个军政兼优的营长，蜕变成怯战畏敌、临阵脱逃，使部队付出惨痛代价的罪人，最终成了以自伤的卑劣行为脱队的逃兵。在一个战功卓著的红军团队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揭露如此严重的内部矛盾，作品的写法足够大胆，却并未损伤这支英雄部队的整体形象。

其三，《东方》对于郭祥、杨雪的爱情描写，亦有特点和新意，在整个作品中占有相当分量，几乎贯穿于作品的始终。郭祥与杨雪的爱情纠结同战争的发展进程相联系，同尖锐的军队内部矛盾相结合，同人物的生活命运相融汇，于战争生活的错综变幻之中，呈现人物关系的悲欢离合。郭祥与杨雪由青梅竹马的伙伴到参军后的战友，本应有建立爱情关系的感情基础，但陆希荣处心积虑的追求，杨雪为表象所蒙蔽的误选，造成郭、杨间爱情关系的波折。在陆希荣卑劣面目暴露和杨雪牺牲后，小说着力描写郭祥在失去杨雪后的内心痛苦，渲染郭祥对杨雪怀恋思念的深情，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而有增无减，绵绵不绝。郭祥

《东方》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好像是从封冻的冷窟挣脱出来的文学所新发的芽苗，让人们察觉到文学复苏的先兆，也为沉寂凋零已久的军旅文学带来振兴的最初希望。

与杨雪的爱情关系近乎悲剧式的结局，反倒检测着人物感情的质地，呈现出英雄战士郭祥对于爱情的始终不渝、纯真如金。50年代以来的军旅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中，涉及人民战士爱情描写的并不多，比较出色的也鲜见。而《东方》在这方面的探索，显然有了不小的跨越。

《东方》在诸多方面所进行的探索性实践，可以看作是对于以往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某些固有观念和写作范式的摆脱和更替，也有对“文革”中畅行的某些极左思潮与僵化思维束缚的冲击。在阴霾四合的年代里坚持此种艺术求索，实属不易。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东方》和其他几部作品大多创作于“文革”期间或“文革”结束之初，大多属于从不同题材领域、不同思想和艺术方位进行突破性探索的实践成果。它们是新时期文学开端之际的最初收获，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繁荣发挥了某种引领与启迪之效。

魏巍在开始写作《东方》之时，本有描写彭德怀司令员的计划，因为要全方位地表现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面貌，不能不写到前线的最高指挥者彭总的活动。由于彼时环境不允许，作家原有的构思无法形诸笔墨，只得留下难以避免的缺憾。他在小说获奖之后，怀着补漏救缺的心思，着手书写彭总在前线的相关章节，于1984年初春发表了以《彭总》为题的新增补章节，至1986年全书再版时正式补入。

这些新增补的章节，均以彭总为

中心展开对战争全局的开阔描写，表现彭总在战争的各个阶段上的主要活动。这些章节对于发生在亚洲东方的这场国际规模的反侵略战争之历史面貌的展现，又超越了原来由一个团队、一个村庄的角度来体认这场战争的有限视野，在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程度上揭示这场战争的时代特征与非凡意义。这些章节对于彭总等高层指挥员运筹帷幄的描写，又是从前线指挥部的视界高屋建瓴地画出战争进程的真实轨迹，使指挥中枢与战斗部队的活动连接、沟通起来，形成统一而有中心的战争全景的艺术描绘。这些章节对于毛主席、彭总等领袖和统帅人物的形象创造，则是在表现这类难度较大的艺术观照对象方面，由片段描写或侧面描写向比较充分的正面描写发展的一种尝试。作家在这些章节里，紧紧把握住彭总这一特定人物的突出性格特征，将统帅者的智慧刚毅和老战士的醇厚质朴融为一体，塑造了一个较为鲜明、丰满的艺术形象。作家为完成新增补章节所作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他最初的预想，也为这个力求展现抗美援朝战争宏阔史实的艺术建构加盖了一个结实的屋顶。

当代军旅文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10多年间，曾有过发展和兴盛的年份，产生过一批长篇小说佳作，它们在新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作出过显著贡献，占有相当的分量。但是它们同整个新中国文学一样，被多年“文革”所阻断。《东方》是在荒圯的废园里奋然耕耘的一道犁铧的印记。它自然接续了“文革”前10多年军旅文学的传统，却也在尽力排除附着其上的某些积习与流弊，寻求与时代行进相对应的新质。《东方》所描写的依然是上世纪50年代的战争和军旅生活，不过它在观察与表现生活的视界和范式方面，对于50年代的军旅文学而言，已是一种延伸、突进和翻新。《东方》的探索性实践，对于“文革”前的当代军旅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而言，似乎是一个终结。对于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而言，则是一次探路者的先行。



胡世宗
来自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魏巍：为大时代吹响号角的人

和了解美军情况，以便开展政治攻势。汉江前线的日日夜夜，战斗激烈而又艰苦，魏巍看到战士们一个个嘴唇干裂，眼睛熬红，耳朵震聋，他们一口炒面一口雪，坚持斗争，想的是祖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想的是解救战火中的朝鲜人民。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反复跳动在他的脑海里：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从朝鲜前线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便被任命为解放军文艺社的副主编，他匆匆地报了到，在一间小平房里，点灯熬油地完成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魏巍以火炽般热烈、海洋般深沉的感情，讴歌了志愿军战士爱国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高贵品质。《解放军文艺》主编宋之的看了，非常赞赏，将文章转给了《人民日报》，并发表于1951年4月11日头版。而在当时，头版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位置，通常用于刊发社论。

《谁是最可爱的人》感动了千千万万读者，魏巍的大名传遍了全国，也震动了文坛。作家丁玲撰文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社长邓拓亲自主持召开了座谈会。接着，魏巍到处接受邀请演讲，做报告，讲最可爱的人的故事。这篇作品传遍了整个朝鲜战场，战士们的心沸腾了。

从1959年到1979年，魏巍写出了75万字三卷本的长篇小说《东方》，可视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宏大续篇。1977年12月的一天，解放军文艺社张文苑副社长让我去魏巍家约写一篇评论文章，我在魏巍家里见到首版《东方》的校样。他说，与抗美援朝伟大战争相适应的应该是一部鸿篇巨制，仅仅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远远不够。写一部长篇的念头，1953年春天他二次赴朝时就在胸中强烈地鼓胀着了。这次他在朝鲜战地生活了9个月，回国后，又一头扎到拉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在那个厂里代职一个车间的党支

部副书记。他清楚，写长篇必然要把前方后方广阔的生活包容进去，他和工人一起上下班，胳膊窝里夹着饭盒，与工人一起排队买饭，工余时间和工人们玩扑克、下象棋。老工人去世了，他去参加葬礼，小青年结婚了，他也赶去祝贺。在二七厂体验生活时，他写出了短篇小说《老烟筒》，还认识了作家钱小惠，他们合作把著名的二七大罢工的素材写成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接着又受革命烈士邓中夏夫人夏明的重托，与钱小惠在南方采访半年，完成了一部《邓中夏传》。这时，魏巍仍未急着动笔写他的《东方》，他觉得写出一部好的长篇来，必须深入研究这个时代，必须拓宽生活领域。这样，在1953年秋冬，他和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夫人刘秋华重返了无比亲切的冀中大地。魏巍细心，带回了一辆破自行车，为了这村那村地跑着方便，他原本就与这里的乡亲们熟悉，这次来，就混得更亲热了。小青年们觉得他的名儿“魏巍”叫起来和当地逗老鸹时喊的“喂喂”差不多，见了他就叫他“喂老鸹”，他听了这称呼觉得很舒坦。他们落脚在抗战时就很熟识的拥军模范“官大妈”家里，在滹沱河两岸走访了许多村庄，还与全国知名的先进人物耿长锁成了好朋友。1958年，魏巍第三次入朝采写志愿军回国的情形，写出了《依依惜别的深情》这篇深挚动人、脍炙人口的文艺通讯。这一切，都是为写长篇所作的铺垫。

1959年2月，魏巍在河北邢台驻军的一个师部驻地正式在稿纸上落笔这部长篇：“平原九月，要算最好的季节……现在一辆花轱辘马车，就正行在秋天的田野上。老远就听见它那有韵的车声，细小的铜铃声也很清脆……”万事开头难啊，那个晚上他在《东方》大标题下，只写出600字。但总算开了头。这年年底，魏巍受命撰写“华北战史”而不得不中断已写出10章草稿的《东方》。



魏巍(右)与胡世宗

1978年9月，《东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手上的三卷本《东方》，魏巍签赠落款的时间是“七八年十一月”。这部作品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于1982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此次搁笔后，魏巍在1963年至1965年夏完成《东方》40万字的创作，又于1973年开始第三次续写。

魏巍在《东方》中，探索和表现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人民那伟大的心灵世界，从纵的方面写了朝鲜战争的全过程，从横的方面围绕朝鲜和祖国前

后方两条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前线主要落笔写一个团，更集中写一个连，后方主要写冀中平原的一个村庄——凤凰堡。小说中的主人公及一些干部战士就是这里的人，这就使交错发展的故事线索和情节得到呼应和统一。1978年9月，《东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手上的三卷本《东方》，魏巍签赠落款的时间是“七八年十一月”。这部作品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于1982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魏巍曾自己解释使用简洁而雄壮的书名《东方》的含义：自从中国革命突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之后，今日之东方已非昔日的东方了，人民在这里站起来了，他们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并还有未显示出的潜在力量，这个力量无穷之大。“东方”这个命名与史诗性的内容是相称的。1999年1月，我

应报纸编辑之约写了一篇专访《属于东方的魏巍》，我把打印稿给魏巍审看，他立即用笔划掉了“东方”二字，写上了“人民”二字。在他的心中，人民的位置永远无比高大，他是属于人民的。他的《东方》是人民的颂歌。

魏巍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停止过深入生活和求新的创作。“胸中自有青松气，尽瘁不唱夕阳残。”这是魏巍63岁生日时《自题》诗中的两句，是他发自内心的吟哦。在创作的长途上，魏巍真的是马不停蹄啊，就连他家卧室的门框上，都放置着一块绘有奔马的图匾，他一本一本地出书，诗集、散文集、杂文集，还有小说。1988年他写长征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很快签赠给我，而我写长征的诗集《沉马》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后赠他，他立即写了评论发在《解放军报》上。1991年魏巍搜集素材到东北，夜半两点钟赶到沈阳，我接了他并陪他去抚顺战犯管理所采访日本战犯在中国改造的经过。在1997年他77岁时，描写抗战题材的小说《火凤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9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魏巍文集》，魏巍亲自打电话告诉我，要送我一套。我在他家看到了戴克家为他口占的四句诗：“军旅文苑半生过/巍乎辉煌人与文/风风雨雨见清标/堂堂十卷见精神”。还有贺敬之的题诗，“群山巍巍群峰峙，魏巍矗立势峥嵘。百年人民文学史，君在亿万人民中。太行红杨上甘松，东方破晓击晨钟。世纪问答谁可爱？笔绘地球飘带红。清流几见浊流涌，夕阳翻作朝东升。我访三门遥致敬，中流砥柱思君容。”这是魏巍的朋友、广大读者也是时代和历史对他的人文与文坛亲切的勉励和公允的评价。而他给我写的条幅上的四句诗：“寒梅无媚骨/喜报春消息/众乐郑卫声/琴不改心曲”，则表达了他那令人感动的、让人永远缅怀的、一贯的正直、真诚、热情和执著！